



春秋青铜器年代 综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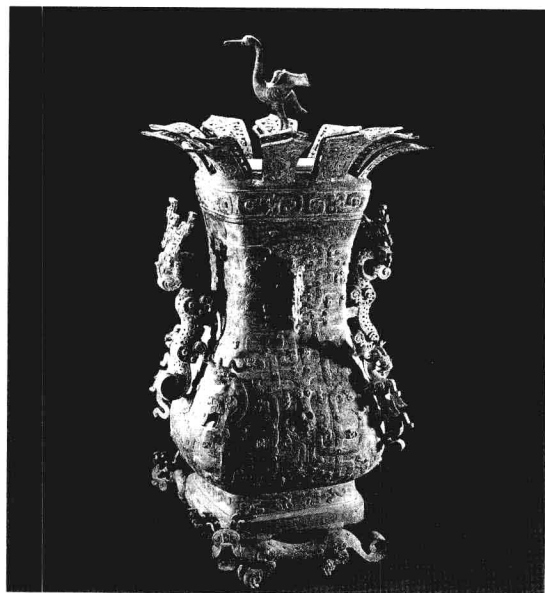
彭裕商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春秋青铜器年代 综合研究

彭裕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 彭裕商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8

ISBN 978 - 7 - 101 - 07985 - 2

I. 春… II. 彭… III. 青铜器(考古) — 鉴定 — 研究
— 中国 — 春秋时代 IV. 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78489 号

书 名 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著 者 彭裕商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½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985 - 2

定 价 32.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与文献不足征的夏商两代相比，周代有许多典籍传世，历代学者对周代各方面情况的传述也比夏商二代为多，这就使得周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较之夏商有了很好的条件。东周时期，作者辈出，载籍弥繁，为东周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但先秦古籍由于著作体例和作者个人观点等方面的情况所限，不可能全面反映当时历史文化的全貌，因此，当今对周代的研究，必然要愈来愈多地结合到考古资料。

青铜器是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数量众多，其本身的发展变化自成体系，且又往往铸有铭文，因而是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现在周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两周青铜器材料是不可或缺的^①。

对任何一种考古材料来说，都必然要经过一番认真的整理，才能更好地将其运用于学术研究，年代学研究，就是整理青铜器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在这项工作中，西周青铜器的研究相对做得较为充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已有许多重要成果发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对东周青铜器的研究，特别是年代学的整理，学者做得相对较少，且研究范围多局限于某个区域，至今尚无全面系统的专著问世，这就造成了周代青铜器研究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限制了周代特别是东周历史文化的深入研讨。因此，对东周青铜器作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将是今后周代青铜器研究的重点和趋势。东周青铜器中，春秋青铜器数量众多，器类丰富，制作精美，发展变化大，情况复杂，是东周青铜器的主要部分，因此，本书定位于春秋青铜器的年代学研究，通过本书的研究，建立起春秋青铜器的年代学框架，在此基础上，数量相对较少，变化相对简单的战国青铜器的年代学研究就相对容易了。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能对两周青铜器分期研究不平衡的状况有所

^① 本书所说的青铜器，主要是指青铜容器。

改善。

春秋青铜器是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数量众多,其本身的发展变化自成体系,因此,找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使其在学术研究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此外,在考古发掘中往往有青铜器伴出,对青铜器的认识关涉到对考古遗存性质和年代等方面的推定,青铜器铭文还提供了许多不见于传世典籍的宝贵史料,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春秋青铜器的研究,将为考古学遗址分期的绝对年代及性质的推定,春秋史的深入研究等学术领域,提供可靠的依据和素材。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诸如汉语史、语言文字学、档案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广泛地联系到古文字和古器物,春秋青铜器分期研究的重要性也将愈益显现出来,其研究成果也将会给各相关学科提供更为准确的年代依据。

有鉴于此,本书定位于春秋青铜器年代学的研究,希望能借此将该项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相关研究的历史回顾	1
第二章 关于商周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6
第三章 春秋时期重要史实研究——虢国东迁考	11
第四章 春秋青铜器的型式	27
第五章 春秋青铜器的典型材料和分期	115
第六章 春秋青铜器的纹饰	151
第七章 春秋青铜器铭文释文及简释	167

第一章 相关研究的历史回顾

东周的政治形势与西周相比,一改西周时期王朝一统的局面,诸侯强大,王室衰微。反映在青铜器上,与西周青铜器相比,东周青铜器的地域特点已比较突出,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客观现象,后来研究东周青铜器的学者,一般都将东周青铜器按国别或区域进行整理。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东周青铜器就是以国别为单位来收录的,但此时尚未涉及到年代学的研究。1941年,容庚先生出版《商周彝器通考》^①,该书收录近千件商周青铜器,按其器类和年代编排,西周分为前期和后期,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但在东周时期,只有少数器类分别归入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如匱、鬻、兽形尊、盆等,其余只笼统地划归春秋战国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宝钧先生出版了《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②,书中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分商周青铜器为六个界标,东周占三个界标,分别以河南三门峡虢国铜器群为东周早期界标,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为春秋晚期界标,寿县朱家集楚墓铜器群为战国晚期界标。此外,还选取了若干单位作为春秋中期、战国早期、中期的代表以及战国晚期的补充。通观其书,在年代划分上,东周时期大别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早、中、晚三期,每个阶段均有代表性的铜器群,较之民国时期的研究,已有突破性的进展。

与西周青铜器相比,东周青铜器呈现出更多的地域特征,研究起来比西周青铜器更为复杂,所以后来许多做东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学者,又往往以文化特征为主,分地域进行研究。

在地域的划分上,学者间也不尽相同,高明先生认为,东周青铜礼器,

①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

②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以产地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即: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山东地区^①。台湾学者陈芳妹先生在研究东周青铜盆、簋类器物时,曾将其分五区进行整理研究,即西方的秦区,北方的晋区,中原的王城区,东方的齐区,南方的楚文化区^②。刘彬徽先生认为,若以青铜敦的器形特征为依据,分三区即可:第一区为楚文化区,第二区为东方齐文化区,第三区为北方中原文化区^③。今综合各家意见,参以笔者的研究,将东周青铜容器按产地大别为四区:1. 以周晋为中心的北方中原文化区;2. 南方楚文化区;3. 东方齐鲁文化区;4. 西方秦文化区。

学者对以上各区东周青铜容器的分期研究,略如下述。

高明先生曾对中原地区东周青铜器做过系统的研究,他选取了北方中原文化区的二十二座铜器墓,以各墓铜器群为单位,将其分为十组六期。文中并未具体讨论各组相当的年代,只是将其分别归入各历史时期,最后只对各历史时期作了年代估计。各组所包含的墓数、与历史时期的对应关系及具体年代的界定如下^④。

第一期 春秋早期 第一组(共二墓)、第二组(共二墓) 公元前 770~前 650?

第二期 春秋中期 第三组(共二墓)、第四组(共二墓) 公元前 650~前 550?

第三期 春秋晚期 第五组(共三墓)、第六组(共三墓) 公元前 550~前 453?

第四期 战国早期 第七组(共二墓) 公元前 453~前 380?

第五期 战国中期 第八组(共二墓)、第九组(共二墓) 公元前 380~前 280?

第六期 战国晚期 第十组(共二墓) 公元前 280~前 221?

在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学者一般都将东周分为六期,即春秋、战国各分为早、中、晚三期,而将铜器群分别纳入六期的框架。

后来,李学勤先生在详细考察洛阳中州路有关重要墓葬出土青铜器器形、纹饰的基础上,认为中州路东周墓葬的第一、二期均应属春秋中期,其对应关系如下^⑤。

第一期 春秋中期偏早

第二期 春秋中期偏晚

①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② 陈芳妹:《盆、敦与簋——论春秋早中期青铜簋盛器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2卷3期。

③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④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下),《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⑤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1~24页。

- | | |
|-------|------|
| 第三期 | 春秋晚期 |
| 第四期 | 战国前期 |
| 第五、六期 | 战国中期 |
| 第七期 | 战国晚期 |

再加上春秋早期,李先生实将东周时期分为七期,与六期分法不同的是将春秋中期析为早、晚两个阶段。

楚文化区的东周青铜容器及相关的考古遗迹研究,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已取得了一些成绩^①。关于楚系青铜器及青铜楚墓的分期,高崇文先生分东周为六期,即春秋、战国各分早、中、晚三期^②。刘彬徽先生在此基础上,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又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他选择了楚文化区 78 座出青铜容器的墓葬,分为七期,春秋时期分为四期,也是将春秋中期析为前后两段,其对应关系和具体年代的界定如下^③。

- | | | |
|--------------------|-----------------|----------|
| 第 1 期,春秋早期(共三墓) | 公元前 770~前 670 年 | 积年 100 年 |
| 第 2 期,春秋中期前段(共五墓) | 公元前 670~前 600 年 | 积年 70 年 |
| 第 3 期,春秋中期后段(共十七墓) | 公元前 600~前 530 年 | 积年 70 年 |
| 第 4 期,春秋晚期(共十六墓) | 公元前 530~前 450 年 | 积年 80 年 |
| 第 5 期,战国早期(共六墓) | 公元前 450~前 380 年 | 积年 70 年 |
| 第 6 期,战国中期(共二十墓) | 公元前 380~前 300 年 | 积年 80 年 |
| 第 7 期,战国晚期(共十一墓) | 公元前 300~前 223 年 | 积年 77 年 |
- 每一期中又进一步分为前后两组,共 14 组。

由上所述,在具体的分期方面,目前中原文化区和楚文化区都有六期和七期两种分法。主要的不同在于对春秋中期的看法,前者将其作为一期,后面则将其进一步分为两期,分别为春秋中期前段和春秋中期后段。

秦文化区,陈平先生做过专门的研究,他在 1984 年发表《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一文^④,文中收录春秋战国秦墓共 33 座,大别为春秋型器群和战国型器群,前者共 17 座墓,分为早、中、晚三期七组,春秋型早期 5 墓,分三组,中期、晚期均为 6 墓,分两组。后者共 16 座墓,分为早、

① 刘彬徽:《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陈振裕:《湖北楚墓综述》,《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学报论丛,1987 年;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②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③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1~55 页。

④ 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上、下),《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3、4 期。

晚两期,早期 4 墓,为一组,晚期 12 墓,分两组。该文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各为早、中、晚三期,但其特别之处,是铜器的分期与历史时期的分期不完全对应,比如其所划分的春秋型晚期铜器群,其年代实际上相当于战国早、中期,并且各期各组之间或有缺环,此外,其所估计历史时期各期的绝对年代也与其他学者有一定出入,具体情况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关中秦墓青铜容器分期简表

纪元期	历史时期	器群	期	组	铜器单位名称
770—678	春秋早期	春秋型器群	早期	1	宝鸡姜城堡铜器墓、宝鸡西高家 M1
				2	户县宋村 M3、甘肃灵台景家庄 M1
				3	宝鸡福临堡 M1
677—577	春秋中期		中期		缺环
				4	凤翔八旗屯 AM9、GM2、BM27
576—477	春秋晚期			5	传世秦公簋、宝鸡阳平镇秦家沟 M1、M2
					缺环
476—385	战国早期		晚期	6	凤翔高庄 M10
					缺环
384—307	战国中期			7	沔西客省庄 K202、凤翔高庄 M48、M49、M18 凤翔八旗屯 CM9
		战国型铜器	早期	8	大荔朝邑 M107、M203、M103 凤翔八旗屯 M31
306—221	战国晚期			9	凤翔高庄野狐沟 M1 宝鸡凤阁岭建河 M 甲、淳化城关战国墓
221—206	秦代		晚期	10	凤翔高庄 M33、M16、M17、M47、M46 临潼上焦村 M18、M12、宝鸡凤阁岭建河 M 乙 咸阳塔儿坡铜器窖藏秦代铜器部分

笔者以为,七期分法相对要详密一些,且由本书第五章附表所示春秋时期各文化区器物流行的情况来看,将春秋中期进一步分为前后两段也是可行的,故本书尽量采用东周七期分法,将春秋时期青铜器分为四期。由本书第五章的研究可知,东周时期中原文化区与楚文化区青铜器发展的情况大致相同,上述李学勤先生将洛阳中州路墓葬第一、二期均划为春秋中期的分法也说明了这一点。山东齐鲁文化区的情况也与北方中原文化区略同,只有西方秦文化区春秋中期材料较少,目前所见材料大都属春秋中

期偏前,无法得知其整个春秋时期的详情,故本书除秦文化区外,其余三个文化区春秋时期都采用四期分法,秦文化区暂用三期分法。至于各期所相当的绝对年代,目前尚不能准确论定,现姑以刘彬徽先生的意见作为一个大致的参考年代范围,前后容可略有出入。

上述各家的研究,只有高明先生对文中涉及的东周铜器作了型式的划分,但其所论仅限于中原器,未及其他地区,且有些器物的归类也值得商榷,如簋、敦等器。除此之外,其他各家均未作型式划分,这不利于使用类型学的手段来研究器物的分期。

本书的研究将充分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类型学的手段对春秋青铜容器作型式划分和各型式流行年代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春秋青铜容器进行分期研究。铜器研究与相关的重要史实密不可分,本书将对相关的春秋时期重要史实作一番较为详细深入的整理和考察,使之更好地为春秋青铜容器的分期研究服务。此外,本书还参照古文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用专门的章节,对本书所涉及到的考古遗迹中出土的有铭青铜器(包括乐器、兵器等)及个别传世器的铭文进行释文和简要的解释,以便于读者能对相关的考古遗迹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充分发挥古文字学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本书希望通过这样的实际工作,不仅能在春秋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探索上有所贡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使铜器分期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得到总结和提高,以利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第二章 关于商周青铜器年代学 研究的方法问题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研究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西周青铜器年代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前我们在《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讨论,书中认为“考定青铜器年代的方法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考古学方面和铭文方面。但由于铭文所能提供的年代依据有限,并且还有很多铜器是没有铭文的,所以这里最有用的是考古学的方法,它能推断多数铜器的大致年代。但铜器铭文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少数铭文能提供非常准确的年代依据,由此可以确定一些年代准确的‘标准器’,二者兼用,相互补充,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现在在春秋青铜容器的分期研究中,笔者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铭文对于年代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河南商水的原仲墓^①、安徽寿县蔡昭侯墓等^②,都是靠器铭确定了墓葬的墓主和随葬铜器群年代的。但是,像这样能提供准确年代的铭文为数极少,且铭文由于文字古奥,学者对其释读往往见仁见智,这自然就会影响到对铜器年代的考定,所以笔者于此特别要强调考古学的方法。

考古学的方法主要有地层学和类型学,都只能推断铜器的大致年代或相对早晚,但其中类型学涵盖面宽,只要有器形纹饰可据,都可以适用。而且实践已经证明,其方法是完全可靠的,并且往往可以纠正由铭文误释而造成的铜器年代的错误,笔者于春秋青铜容器的年代研究中,更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晋公盂为晋国国君所作,是一件著名的传世青铜容器,学者对其多有考释和研究。由于该器铭文中“余惟今小子”等语句,学者多据以推测其年代。以前郭沫若先生曾在初版《两周金文辞大系》中认为历代晋公无名“惟”者,近似之字则为襄公骊,故推定当为晋襄公所作器,唐兰先生认为铭

① 秦永军等:《河南商水县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4期。

②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中的“惟”当即晋定公午之名,因而推定该器作于晋定公时^①,杨树达先生也有类同看法^②。此说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几成定论。日本学者白川静氏还根据该器所记历日“惟王正月初吉丁亥”推定该器作于晋定公三十六年,当公元前 475 年^③。后来,李学勤先生撰文,指出所谓晋定公名的“惟”字,实为从虫的字,当隶定为“雌”字,应读作“唯”,是语词而不是人名^④。他根据器铭中所提到的晋楚婚姻之事,从吴闿生之说,认为当是《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 538 年)所记的楚灵王求婚于晋,晋平公许之的晋楚婚姻之事,次年,晋平公送女于楚,因而该器制作年代当为晋平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 537 年。笔者也曾同意这样的看法^⑤,并指出所谓“雌”字实是战国古文“虽”字^⑥,虽、唯古通,此读作语词“唯”,但语气上都有虽字的转折之意。总之,据现有研究,该器年代大致当春秋晚期。李先生推定的年代略为提早,当春秋中晚期之际。

但笔者在对东周盆类器物整理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晋公盨的器形、纹饰与学者推定的年代不合,该器的器形、纹饰流行于春秋早期后段到春秋中期前段。

该器器形属笔者划分的盆类Ⅱ式^⑦,属该式的盆类器有如下一些。

河南信阳明港段湾墓铜盆^⑧、71 河南新野墓铜盆^⑨、樊君夔盆^⑩、河南浙川下寺 M2“铜盨”^⑪、曾孟燭谏盆^⑫、鄢子宿车盆^⑬、黄太子伯克盆^⑭、子祺盆等^⑮。

① 唐兰:《晋公惟盨考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 4 卷第 1 号。

②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三《晋公盨跋》,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③ [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五,神户,白鹤美术馆,1975 年,第 455 页。

④ 李学勤:《晋公盨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⑤ 彭裕商:《金文研究与古代典籍》,《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 年第 1 期。

⑥ [宋]夏竦:《古文四声韵》卷一脂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 页下。

⑦ 彭裕商:《东周青铜盆、盥、敦研究》,《考古学报》2008 年第 2 期。

⑧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信阳县明港发现两批春秋早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⑨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⑩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⑪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图一一四: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37 页。

⑫ 《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⑬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9 期。

⑮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铭文原文有误,应为:唯子祺铸其行孟,子孙永寿用之),《文物》1980 年第 1 期。

以上的Ⅱ式铜盆可据相关材料推断其年代。

信阳段湾墓同出还有铜鼎、鬲、壶、盘等,器形都较早,报导者认为当属春秋早期,但该墓铜器如盘、壶、盆等已出现了一些新样式的花纹,与春秋初期的纹饰不同,故其年代当属春秋早期后段。⁷¹河南新野墓同出有铜鼎、甗、簠、盘、匜,器形均属春秋早期,而纹饰与段湾墓铜器类同,且铜盆腹部为“吐舌蟠螭纹”,学者认为,这种“吐舌蟠螭纹”的产生可能在春秋早期之末或春秋中期偏早^①,故该铜器群的年代应与段湾墓相当,也属春秋早期后段。樊君夔盆一般认为属春秋早期^②,但其纹饰为“吐舌蟠螭纹”,也应属春秋早期后段。浙川下寺 M2 同出器物较多,有铜鼎、簠、簠、盞、壶、尊缶、浴缶、盘、匜等,墓葬的年代大致当春秋中期后段,但所出铜盆有学者认为可早到春秋中期前段^③。鄢子宿车盆、黄太子伯克盆、子祺盆等三器,双耳衔环,盖上不是圈形捉手,而是三个等距的小形握手,或为虎形,或为牛形,彼此器形纹饰类同,年代应大致相同。出鄢子宿车盆和子祺盆的墓葬,发掘者认为当属春秋早期,出黄太子伯克盆的墓葬发掘者认为属春秋中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子祺盆属春秋中期^④。通观三墓所出器物,出鄢子宿车盆的墓可能略早,当属春秋早期后段,其余二者约属中期前段。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Ⅱ式铜盆流行于春秋早期后段到春秋中期前段。

在纹饰上,晋公盥也有较早的特征。

该器肩部纹饰为蟠螭纹,腹部为波曲纹,纹饰线条均较细密。其纹饰与子祺盆非常接近,而晋公盥腹部的波曲纹则较早。波曲纹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流行的纹饰,春秋中期前段仍有流行,但线条已变细,如甘肃礼县圆顶山秦墓 98LDM1:25 铜鼎腹部、98LDM1:24 圆壶下腹部^⑤、98 LDM2 铜鼎腹部^⑥、陕西宝鸡阳平秦家沟 M1 铜鼎腹部等^⑦。甘肃礼县圆顶山的

①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②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一〇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9~70页。

④ 李学勤:《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⑤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图五:4,《文物》2002年第2期。

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礼县圆顶山 98LDM2、2000LDM4 春秋秦墓》图四:1—3,《文物》2005年第2期。

⑦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宝鸡阳平秦家沟秦墓发掘记》图五:2,《考古》1965年第7期。

几座秦墓,铜器纹饰均为较细的线条,与晋公盨的纹饰也很接近,这几座墓的年代都大致在春秋中期前段。总之,晋公盨的纹饰是春秋中期常见的。考虑到其器形细部,如盥耳有兽头装饰,则与子淇盆相同,推测其年代当与后者接近,大致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或中期前段。

在铭文上,该器也有较早的特征。其字体粗疏,与晋姜鼎、秦公簠等相近,前者属春秋早期,后者 1923 年甘肃省天水县出土,学者以为秦景公所铸器^①,其器形、纹饰接近甘肃礼县圆顶山 98LDM1 的两件铜簠,当属春秋中期前段^②。措辞方面,该器与以下一些器物有类同的语句。

晋公盨: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

乖伯簠: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

师克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

毛公鼎:丕显文武……膺受大命。

秦公钟:膺受大命。

秦公钟学者认为属秦武公^③,为春秋早期之器,其余几器均属西周晚期^④。

晋公盨:余虽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

单伯钟:余小子肇帅型朕祖考懿德。

梁其钟:梁其肇帅型皇祖考,秉明德。

番生簠: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丕元德。

叔向父禹簠:肇帅型先文祖,共明德。

秦公簠: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

上举器物,除秦公簠外,均为西周晚期器^⑤。秦公簠当属春秋中期前段已见前。

晋公盨:余咸畜胤士。

秦公簠:咸畜胤士。

上举材料说明,晋公盨在措辞上接近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器铭,而尤其与年代属春秋中期前段的秦公簠接近,这与其器形、纹饰所反映出来

①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9页。

②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下册344,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

③ 卢连成等:《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文物》1978年第11期。

④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15~516页。

⑤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422页、426页、431页、392页。

的年代特征相合。参照刘彬徽先生的研究,楚文化区春秋中期前段相当的年代在公元前 670 年~公元前 600 年,据笔者近年的研究,东周时期,中原文化区、山东齐鲁文化区均与楚文化区青铜器发展的情况大致相同,再综合晋公盨的器形、纹饰、铭文字体、铭文措辞等考虑,笔者推测其年代上限有可能略早于公元前 670 年,而其下限不应晚于公元前 600 年。这一段时间的晋楚婚姻未见《左传》记载,不过,未见记载不等于没有,其实有很多古文字材料记载的史实都不见于传世文献。以常理推之,晋楚如历来无婚姻关系,楚灵王恐怕也不会派人去晋国请婚了,所以该器记载的晋楚婚姻关系,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

这里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古文字材料与传世典籍的对照问题。大凡有记述某个历史事件的古文字材料,学者往往都要将其与古籍相比附,似乎这样才能使古文字材料更有学术价值。但由于古文字材料不仅文字古奥,不易正确释出,且也记述简略,要真正做到与传世典籍相对照而不误是很难的,上所论晋公盨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笔者以为,将古文字材料与传世典籍相对照要特别谨慎,首先二者年代要相一致,如果器形、纹饰所反映出来的年代特征与所释铭文内容不符,则多是铭文考释或理解有误,这种情况下,就宁可不与传世典籍相对照,而应以器形、纹饰的考察为准来推断年代。